

傳播館 3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Michael Gurevitch等著

陳光興等譯

文化， 社會與媒體





傳 播 館



 遠流出版公司

傳播學名著譯叢

文化，社會與媒體

原 書 名／*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作 者／Michael Gurevitch等

譯 者／陳光興等

主 編／陳世敏・潘家慶・鄭瑞城

執行主編／曾淑正

責任編輯／彭春美

發 行 人／王榮文

出 版 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365-3707

傳真號碼／(02)365-8989

發行代理／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365-1212 傳真號碼／(02)365-7979

印 刷／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天翼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 1992(民 81)年 5 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27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1406-7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Michael Gurevitch等著
陳光興等譯

文化， 社會與媒體

《傳播學名著譯叢》譯著前言

傳播學的發展，令人眼花撩亂？

這個學術領域，一度有人宣稱它逐漸消失了；有人說它走到十字路口，正待抉擇去路；有人說它潛沉蟄伏，蓄勢而發，就待春雷乍響。

這些片片馬賽克所拼湊的傳播學面目，像極了快速流洩而過的電腦動畫，令人無法預知下一秒鐘的圖像變化。新聞學延伸出來的媒介效果研究，歷經幾度枯榮，與社會科學結合，成為傳播學。還沒站穩腳跟，傳播學就迫不及待與其他學問進行分工與整合。現在的面目是：

第一、傳播學變成了其他學問的應用科學，產生了政治傳播、組織傳播、教育傳播、健康傳播、環境傳播、危機傳播等跨學科的新領域。

第二、傳播學向其他學問借光，逐漸自立門戶，形成傳播學的一部份枝幹，例如傳播社會學、傳播生態學、傳播政治經濟學、口語傳播學、大眾文化、傳播的文化研究、傳播的批判理論等領域，大大豐富了傳播學的內容。這方面，共同的源頭活水，是傳播革命。

短短五十年歷史，人類經歷了數次傳播革命，使傳播媒介深入社會，改造了當今人類社會的下層結構，也把傳播學術，一再推向另一個令人眼花撩亂的十字路口。

本譯叢目的，即在呈現傳播學繁複多變的面貌，選書時，不拘新舊、學派、取向、範疇，凡自成一家之言，或對傳播的學術和專業有

過顯著影響的著作，都予列入。我們認為，現階段呈現傳播學的諸般「可能」，遠比為它劃定界線重要得多。

譯者都是這一行學有專長之士，自選他們心目中的傳播學經典之作。有的選書，是因為那本書是他的「聖經」；有的選書，是因為那本書是他的「最愛」。編輯委員會都予尊重，因為這樣可以避免編輯委員會先入為主劃地自限；其次，無論是個人的聖經或最愛，多年廝磨，翻譯起來當更得心應手。謝謝他們為描繪傳播學面目所盡的力。

《傳播學名著譯叢》編輯委員會 謹識

民國八十年十月

目 錄

《傳播學名著譯叢》譯著前言

譯 序

原 序

- 第 1 篇 媒體研究：理論取向 23
 (J. Curran, M. Gurevitch, J. Woollacott; The study of the media: theoretical approaches; 唐維敏譯)
- 第 2 篇 媒體理論與社會理論 49
 (Tony Bennett; Theories of the media, theories of society; 蔡崇隆譯)
- 第 3 篇 意識形態的再發現——媒體研究中被壓抑者的重返 87
 (Stuart Hall;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黃麗玲譯)
- 第 4 篇 大型企業與傳播工業的控制 137
 (Graham Murdock;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程宗明譯)
- 第 5 篇 文化依賴與大眾媒體 185
 (J. O. Boyd-Barrett; Cultural dependency and the mass media; 鄧宗德譯)

中英對照索引

英中對照索引

譯 序

——英國文化研究的歷史軌跡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回到母校輔仁大傳系兼課，教的是媒體及文化批判的課程。在尋找課程教材時，才發現相關媒體及文化研究具有批判色彩／傳統的中文材料幾乎完全不存在；特別是在研究所的層次，如何使剛開始想要跨入門檻的第一年研究生能夠接觸到「非主流」媒體傳播研究對於這個領域的看法，擺脫行為主義的限制，成為我教學上的一大障礙，甚至是一種焦慮。在這種情況下，翻譯似乎成為一個無法逃避的方向。

秋天之後，雖然因為私事及地理位置上的區隔，無法繼續兼課，但是仍然和大家定期聚會，一起唸書，共同翻譯研讀一些文章也就逐漸成為讀書會能夠持續下去的一股動力。

原先的翻譯計劃是想集結許多本書中的「重要」文章，能夠將批判性媒體／文化研究的重要剖面呈現出來。後來於版權、時間等諸多問題，結果在這裡選譯的文章全部出自英國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出版的《文化，社會與媒體》一書。

〈媒體研究：理論取向〉一文，從自由多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於媒體權力看法上的差異性出發，進而討論媒體機構的幾個重要面向，最後指向結構主義、政治經濟學及文化研究等七〇年代後崛起的新興研究取向。

〈媒體理論與社會理論〉一文的基調是，任何對於媒體的作用、

權力、角色之看法及談法，其實都暗示了不同的社會理論；如何看待社會的形構，經常會導致其對媒體在社會中關係位置的認識。這篇文章大致上沿着學術思想史的發展，探討了四個不同傳統的媒體理論：大眾社會，自由多元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及近期文化研究對於意識形態理論的發展。

〈意識形態的再發現——媒體研究中被壓抑者的重返〉則企圖將意識形態的理論與媒體研究相結合，將媒體與社會霸權運作之間的關聯作了相當的釐清，可以說是媒體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篇文章；它不僅替媒體研究展開了新的研究方向，也準確地捕捉到媒體運作的主要場域——意識形態。

「大型企業與傳播工業的控制」是媒體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經典作，它整合了諸多研究的成果，也劃出不同研究取向分析的焦點；更重要的是本文呈現了媒體控制的不同層次及機制，在釐清概念及分析層次上提供媒體政經研究的範本。

〈文化依賴與大眾媒體〉檢視媒體在第三世界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不同種理論取向，特別是這些取向所暗藏的意識形態。

總體上來說，這幾篇文章編織出批判性媒體研究的片面圖型，企圖給予讀者一些初步的認識及感覺；如果因為它的出版，能夠提供另一種的看法，另一種不同於主流論述的簡圖，那麼我們的目的也可以說是達到了。如果讀者唸得有些昏頭轉向，不知所云，所以希望更進一步能有深入的瞭解，因而投入更多的時間閱讀相關的文章，大家的辛勞或許也就值回票價。

由於原文作者的寫作脈絡是英國社會，譯序的重要目的則在提供讀者一個更為寬廣的歷史軌跡。如果我們將媒體視為文化生產的一環，

那麼寬鬆界定的英國文化研究發展的點滴，或許能夠讓熟悉主流論述的讀者認識到以下幾篇文章的「偏見」來自何方。

一、新左派與文化研究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已經逐漸不再具有特定的指稱，它已經快速地滲入各個領域，所召喚的是一羣不願意被綁鎖在單一既定的學科之中，或是僅專注於特定文化形式的研究者。但是如果用較為狹窄的歷史界定，英國文化研究所指涉的是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知識傳統。它在學院內的建制化，可以說肇始於一九六四年在伯明罕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七〇年代中期以後，文化研究逐漸在英國內部擴散，許多學校開始授予文化研究的課程與學位。七〇年代末期以後，開放大學集結了「大眾傳播與社會」與「大眾文化」等課程小組成員，精心編寫教材，使得文化研究的影響力更廣為散佈，本書即為教材修訂後的部份論文。八〇年代初期起，文化研究更擴散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國等地。

任何社會文化理論的出現，與其所處的特定歷史經驗相互關聯，英國文化研究的浮現亦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社會面臨全面性的調整，從生產關係、政治民主到文化形構上，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現代化」所指稱的即是社會結構轉變的表相，由工業資本主義轉形成「後工業晚期資本主義」(post-industrial-late capitalism)被史學家用來描繪這種轉化。

在文化上，美國文化的入侵，以流行音樂、麥當勞的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形式包超了英國的文化環境, 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科技的資本化及理性化, 填滿了整塊文化生活空間。大量人口首次被吸進這塊空間。「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危機確實威脅到原有的「本土文化」; 這種威脅所指向的不必然是精英階級或是社羣文化, 而是工人階級的文化, 以及文化形構民主化的可能性。

關切文化議題／走向逐漸成為左翼知識份子的焦點, 也正是文化研究得以浮現的歷史條件之一。

在政治上, 文化研究的出現與英國新左派 (New Left) 的崛起密不可分。準確的來說, 「新左派」之名誕生於一九五六年的歷史環結中; 十一月蘇聯坦克開入匈牙利鎮壓匈牙利革命; 不久, 英法入侵蘇伊士運河區。這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很明顯地揭露了兩種極為不同的體制——西方帝國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在操作上具有相同的暴力性及侵略性。在匈牙利事件之後, 英國的社會主義份子已經不可能盲目的相信史達林主義的教條, 甚至必須根本地質疑蘇聯革命以降的歷史大悲劇。另一方面, 蘇伊士事件也使左翼份子覺醒到殖民主義並未終結, 福利國家的出現更不代表剝削的消失。也就是在這樣的節骨眼上, 作為一種思想運動, 新左派企圖去找尋第三種政治空間, 重新界定新的社會主義立場。

新左翼的形成結合兩個不同的傳統, 或者是兩代不同政治經驗的羣體。第一個傳統, 以湯普森 (E.P.Thompson)、薩韋利 (John Saville)、霍布斯班 (E.Hobsbawn) 為代表, 他們在三〇年代曾投入反法西斯主義人民戰線的運動; 主要成員多為歷史學者, 在英國共黨組成歷史小組, 匈牙利事件後在黨內因批判史達林主義而被剝奪發言權, 脫黨後集結在《新明理者》(The New Reasoner) 雜誌之下。霍爾 (Stuart Hall) 以共

產主義的人道主義來稱這一個傳統。第二個傳統是存在於英共路線之外的獨立社會主義份子，以賽米歐（Raphael Sammuel），泰勒（Charles Taylor）與霍爾為代表。由於諸多成員來自國外，特別是第三世界，所關切的問題較具國際主義的色彩，對史達林主義始終保持較為批判的態度；一九五六年的歷史事件後，發行《大學與左翼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雜誌。

這兩個刊物在獨自運作的壓力下，提出了合併的構想；並且召募了新的成員，諸如麥肯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米里班（Ralph Miliband）、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之後，在一九六一年正式合併為《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至今已四十年。

新左派的形成，主因在於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無法在理論及政治的層次上處理英國社會逐漸面對的重要結構／歷史性問題：晚期資本主義的特性，經濟及政治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新形式，在所謂民主世界中種族歧視的嚴重矛盾；各種形式的權力關係中，文化及意識形態所扮演的角色；消費性資本主義對工人文化所造成的影響……等。

更具體的來說，英國社會在二次大戰後所產生的變動，如經濟蕭條、生產方式的重組、福利國家的建立、冷戰態勢的形成，似乎重新調整了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的調整，被認為是英國社會發展中一次重要的斷裂。新左派所提出的重要問題是：

1. 到底是哪些因素組成了在質上的斷裂？
2. 英國社會是否已經進入所謂「晚期資本主義」？

3. 福利國家的出現所展現的到底是根本的改變，還是只是社會浮面性的重組？

4. 如果說以往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造成了複雜而特殊的社會形構

(social formation)，那麼正在發生中的又是何種社會形構？

5. 這些轉變是否又造成文化形構上的改變？

6. 這些轉變是否又改變了階級關係？

這策略性問題的辯論，也就形成當時新左派的重要問題意識 (problematics)；也界定了文化研究出現的空間。

因此，文化研究能夠浮現的歷史條件，正是對二次大戰後英國社會全面性的反思；在當時文化研究並不被視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興起，而是一種文化政治層次的介入。也就是說，在一開始文化研究就與英國社會緊密接合，參與的成員大都投入社會運動之中，知識上的關切 (intellectual concern) 與政治上的堅持 (political commitment) 無法做截然的區分，這些是它與英國既有體制中學院派最大不同之處。在論述層次上，早期的關切表現在幾本重要的著作：郝嘉 (Richard Hoggart) 的 *The Use of Literacy* (1958)；威廉士的 *Culture and Society* (1961)、*The Long Revolution* (1965)；以及湯普森的 *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8)。

面對英國社會的轉型，特別是在階級的層次上，主流的論述認為英國在進入後工業時代的過程裏，社會資源財富分配的問題已經被戰後福利國家的擴張，以及管理 (management) 革命所解決；「組合主義」 (corporation) 以「大資本、大國家」的運轉方式，造成傳統階級文化的瓦解，使得工人中產階級化。其中明顯的指標就是美國化：漢堡、流行新興市郊 (suburbia) 社區、大型購物中心 (shopping mall) 的浮現，就是社會全面中產階級化的表現。

相對來說，老左派認為資本主義體系依然是英國社會最終的本質，所有的改變都只是浮面的現象。階級及階級鬥爭依然是最為根本的社

會矛盾；只要對此質疑，就是背叛了革命。

新左派的立場拒絕上述兩者極端化的論述：「在全面的改變」或是「沒有任何改變」之間，新左派承認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有結構性的改變，必須重新分析新形式的財產權，新形式企業體的組織方式，新形式積累及消費之動力……，這些過程確實造成了社會結構及政治意識上轉變的效果。

消費主義的擴散瓦解了許多傳統文化上的認知及社會位階 (social hierarchy)，也產生了新的社會認知及位階的重組。這些效果到底在哪裏，都必須被細緻的來分析。

也正是在試圖勾勒出英國社會多重變遷的意義中，新左派首次展開有關文化的辯論。

文化研究的出現也正是處於社會上客觀條件的召喚，因為社會變遷的感受是在文化／意識形態場域的論述中呈現；在社會意識中，文化層次的運轉不再被認為是次要的，而是社會的主要面向之一；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在面對社會劇變的浪潮中，必須在文化論述中找到新的語言：如何與社會潮流及大眾意識相接合，重新提出社會主義的論題及認識新世界的方式，成為極重要的戰略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中，新左派將文化分析及文化政治的問題搬上檯面，做為其政治上的核心施力點。

在效果上，新左派攻擊了傳統對於政治的狹隘界定，以權力關係普遍存在社會各個領域的想法企圖延展政治的意義，在延展的過程中認識到社會衝突的多種潛在空間。政治上，新左派在支持強而有力的工會主義的同時，也反對生產的場域是惟一能夠帶來革命的想法。也因此對正統馬克思主義提出質疑、挑戰與修正。

二、文化研究的政治脈絡

除了新左翼的崛起部份地開拓了文化研究的空間之外，大眾傳播媒體及次文化的發展亦成為一九六〇年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脈絡。大眾傳播媒體逐漸突顯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以娛樂的形式滲入人們的生活空間，更重要的是在意識形態層次的作用，特別是在新聞及紀錄片的呈現中直接與政治環境扣連。同時，工人、青少年次文化形式的出現又似乎在對牽制性的權力結構進行挑戰。這些現象的浮現都直接影響到文化研究的研究焦點。

一九七〇年代，女性運動及新右派(New Right)的興起，對文化研究造成直接、強而有力的影響。女性主義運動在政治及理論層次上都碰觸到文化研究前期發展中所忽略的問題，性別關係及性別差異問題在社會空間的浮現，直接挑戰到文化研究既有的社會認識論架構。六〇年代人種問題的提出，七〇年代性別議題的呈現，使得文化研究在研究上提出階級、人種、性別做為建構社會權力關係的三根主軸。相對來說，作為一般政治及意識形態的力量，新右翼保守主義的逐漸成形，在態勢上打破了以工黨為主導的左翼組織力量，使得左翼無法提供有效的相對策略及回應。七〇年代後期，霍爾對於新右翼敏銳的觀察，是頗具前瞻性的論述；霍爾當時提出的示警被證實是有戰略意義的，七〇年代末期至今，英國右翼長期執政已經徹底將英國社會改頭換面，而左翼也在一開始輕敵的狀況下無法反擊。八〇年代末期，「新時代」(New Times)的概念，由左翼刊物*Marxism Today*提出，即是企圖重新理解二次大戰後再一次的變格。如何重新思索問題、調整左

翼運動策略，直到今日依然是文化研究所直接面臨的政治問題。

三、文化研究的理論軌跡

上述的歷史性及政治上的關懷，在文化研究的理論發展中，以一連串的辯論和挑戰的形式出現；在每一次的論戰中，文化研究都在變換它的腳步，不去固守原有的立場，在辯論中取得發展上的活力及養份，這也是文化研究能夠不斷求變、繼續存活下去的主因。

從辯論的策略上來看，文化研究通常拒絕被逼到死角，走向極端，而往往在辯論的兩極之間找尋中間位置；他們深信辯論的目的不在戰勝，而在於如何使分析能夠更貼切於現實世界。這種近於新實用主義(neopragmatism)的戰術運用，確實使得文化研究不斷地得以深化其理論上的發展。

文化研究發展的初期，即是以辯論的方式出現。郝嘉、威廉士及湯普森的社會主義者的人道主義(socialist humanism)，及新左派直接挑戰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化約論，強調具有創造力行動主體的重要性，以及文化生產的決定性力量。同時他們對既有文學及歷史研究的精英主義將工人階級文化排除於歷史之外，提出挑戰。第一波的文化研究將文化視為鬭爭的場域，主戰場的組成為人們具體的生活經驗及文化產品(cultural text)；批評的目的在於釐清文化產品如何再現及扭曲生活經驗。

文化研究逐漸形成的文化主義立場(culturalist position)，在六〇年代末期，七〇年代初期與阿圖塞(L. Althusser)結構馬克思主義(Structural Marxism)的反人道主義，展開辯論。(參見霍爾，1980)結構馬克思